

Mc  
Graw  
Hill

Education

Sixth Edition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 发现社会之旅

——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美]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著

中华书局

# 发现社会之旅

——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美]兰德尔·柯林斯 著  
[美]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李霞译

中华书局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sixth edition ISBN: 0 - 07 - 011883 - 3

Copyright © 1998, 1993, 1989, 1984, 1978, 1972 by The McGraw - 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cept as permitted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Act of 1976,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 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 - 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Zhong Hua Book Company.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中华书局和美国麦格劳 - 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 - 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美)柯林斯,  
(美)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书名原文: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ISBN 7 - 101 - 05027 - 1

I. 发… II. ①柯…②马…③李… III. 社会学 - 思想史 -  
西方国家 IV. C91 - 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848 号

---

**书 名**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著 者** (美)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译 者** 李 霞

**责任编辑** 董慧洁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1/4 插页 2 字数 36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5027 - 1/Z · 544 **定 价** 32.00 元

---

Randall Collins and Michael Makowsky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根据麦格劳-希尔公司 1998 年版(第六版)译出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S 1998

## 前 言

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 20 世纪初的 1900 年的一个预言。发出这个预言的人是第一位伟大的非洲裔美国社会学家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他的预言如下:“20 世纪的问题就是肤色界限的问题,这个问题所关涉的是种族差异……会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剥夺世界上超过半数的人最大可能地分享现代文明的机会和权利的理由。”20 世纪发生了很多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与之相伴的是其恶性的种族主义及其企图终结自由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现代性体制的计划;1917 年,共产主义通过革命执掌政权,1989—1991 年苏联因革命而解体;大萧条、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这一世纪下半叶对政府官僚机制的反叛;两次世界大战对全世界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破坏,以及人们所面临的可能摧毁全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这一威胁在 1980 年代曾达到顶峰,所幸在之后有所减退;工人运动的兴起与衰退,以及两次不同的妇女运动所取得的小小胜利。所有这些社会变化都反映在社会学家的关注中。尽管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民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但杜波依斯的话仍提醒我们记住一些未竟的事业:随着从非洲、亚洲和中东来的移民逐渐增加,种族分层在美国依然存在并蔓延到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西方其他的富裕社会。从全世界来看,

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差距、世界体系理论所称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这种划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对应于北半球的白人国家(目前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也加入了这个集团)与南半球的非白人国家——之间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杜波依斯提出的“肤色界限”问题,虽然是用100年以前的术语表述出来的,却指向社会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内部,还存在于这些富裕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

在这一新版中,我们扩展出了整整一章来论述非洲裔美国人类社会学的出现。杜波依斯本人和他的后继社会学家们从各个维度考察了种族分层与种族冲突,既包括黑人社区与主流白人社会之间的分层与冲突,还包括黑人社区内部的分层与冲突。本版的扩充部分还包括对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给予了更多的论述,这位美国社会学家最有力地把握了美国组织化权力的宏观结构,以及那些他认为正把我们带向核战边缘的力量。我们大多数人在相对平稳的时期,会倾向于将一些事情看作往昔旧事——种族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即使没有消失,也是减弱了;战争与世界毁灭的威胁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杜波依斯和米尔斯,以及其他一些伟大的社会学家都警告我们要透过表面去看问题。只有理解了社会结构的形态以及社会过程的动力学,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并理性地参与今后大的社会斗争,这些斗争是历史必然为我们预备着的。

本书的主要目标仍是阐述社会学伟大的经典传统的发展。其主要脉流已经持续发展了将近两个世纪,我们试图在围绕这一线路的复杂的争论与研究中清晰地标识出其过程。我们确信,这一社会学核心传统已构造出了一种相互关联的、揭示社会现实之本

质的东西；在面对新的事实和问题时，社会学的解释力也在不断增强。一场伟大的智力探险正在进行，而我们将继续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获得对这场戏剧（本书所论述的思想和发现之流发源于此，最后也将汇合于此）的某种体悟的话，这本书就达到它的目的了。如果读者能对本书所述的知识领域的现实有所认识的话，那本书就双倍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社会的发现者们过去是、现在还是与我们生活在类似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中的真实的人。我们希望，一些读者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会加入进来，为自己创作出“发现社会”的续章。

## 致 谢

感谢鲍勃·布劳纳、亨利·爱德华、特洛伊·杜斯特和鲍勃·帕克在我们为这个新版本准备资料的过程中所提出的有益的讨论。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 目 录

前言 .....	(1)
导论 社会与幻象 .....	(1)

## 第一部分 19 世纪理性主义的兴衰

第一章 巴黎的预言者:圣西门与孔德 .....	(26)
第二章 地下社会学:卡尔·马克思 .....	(45)
第三章 最后的绅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	(81)
第四章 尼采的疯狂 .....	(102)
第五章 空想社会改良家、进化论者和种族主义者 ..	(127)

## 第二部分 伟大的突破

第六章 得雷福斯的帝国:爱弥尔·涂尔干和 乔治·索雷尔 .....	(158)
第七章 马克斯·韦伯:世界的除魅 .....	(184)
第八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非理性的征服者 .....	(222)
第九章 发现不可见世界:齐美尔、库利和米德 .....	(256)



## 第三部分 20 世纪迈向学术娴熟的曲折之途

第十章	发现日常世界:托马斯、帕克和 芝加哥学派 .....	(290)
第十一章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兴起:杜波伊斯、 弗雷泽、德雷克和凯顿 .....	(306)
第十二章	社会系统的构建:帕累托和帕森斯 .....	(337)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阴影:米歇尔斯、曼海姆 和米尔斯 .....	(362)
第十四章	欧文·戈夫曼和社会交往的剧场 .....	(401)
第十五章	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当代社会学理论 .....	(424)
第十六章	20 世纪后期妇女对社会学的冲击 .....	(479)
译后记 .....		(514)

## 导论

# 社会与幻象

我们都认为自己很了解社会。但事实上,社会世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而由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加深了其神秘性。社会是贴近我们生活的日常现实,但是,我们并不只因为生活在其间而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就像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必然作为有生命的身体存在而对生理学有更多的了解一样。社会学的历史漫长而艰辛,它致力于揭示那些隐藏在背后或人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物:那些我们不知道其存在的、处于遥远的空间与时间中的社会,它们的生活方式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生活的本质;那些被我们曲解了的、有别于我们自身的社会阶级与文化体验;那些处于我们社会结构边缘部分的各种现实,从警察的巡逻车内到政治家们和神父们紧闭的门户之后;那些我们周围的、被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事物,即由各种看不见的规则与机制组成的系统,它控制我们的行为并操纵我们的思想,它似乎像自然风景一样是永恒的,但事实上它像孩子的手势一样变化不定。在所有事物中,最令人困惑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行动、思想和自我印象(self-image)——那些我们与

我们的朋友、恋人、熟人和陌生人不断达成的默许协议,以及我们在各种情绪、习惯和信仰之间所采取的把握方向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是隐藏在我们通常的意识界限之下的。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能通过选择成为自己行为(如果不是自己的命运的话)的掌控者;实际上,我们对这二者的根源都知之甚少。如果说今天社会世界还掩藏在我们的认识之后的话,那当我们向上追溯历史时,那时的社会世界之于人更是一种幻象。在欧洲历史上,只要上溯几百年,就是一个国王和贵族的权威被神圣权利(divine right)合法化的时代。那时候,人们的一些反常行为被归因于巫术和魔鬼的发作,而其他的国度则被认为不仅充斥着嗜血的共产主义者或可怕的野蛮人,还充斥着狼人和独眼巨人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声言:“历史是一场噩梦,我要从里面醒过来!”社会学就是这种缓慢的苏醒过程中的一部分。

我们所了解的和已经了解的社会世界大部分都是幻象。不过,如果我们已完全陷入此幻象,就没有必要试图对社会进行研究和解释了,那么这本书也和其他著作一样毫无价值了。幻象的存在与事实和逻辑原则的存在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但事实和逻辑则不可避免地与概念和理论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社会研究中用来解释事物过程和原因的概念和理论也是作为我们日常行动之依据的概念和理论。

社会学并不是一门不可能的科学,但的确是一门很艰难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从日常信念之网中疏离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想当然的假设被质疑和被取代而一步步推进的。就像当年人们描述哲学一样,社会学也像是在用一块块木板重建一条船,再乘着它漂浮于大海之上。

社会学的历史是一个各种世界观不断进展的过程,每一次在另一方面的拓展都会提出一些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会消除以前的一些困惑,或者融汇进一些以前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每一种世界观,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存在着一些幻象,科学的旗号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作为真理的确实保证。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理解社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包括一些最近的成果,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确信,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 幻象之根源

那张遮蔽我们视野之网的核心是我们的这一认识,即我们的知识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事实”是那些各个独立观察者能共同认可的东西,但是,为了能看到事实,我们必须先去寻找它们,而我们去寻找什么东西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我们能回答什么问题取决于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但是,问题的形式并不是决定其答案的唯一决定因素,否则我们的知识将永远不可能超越特定提问者的主观观点。任何完全主观的观点都会失去其有效性,因为其他任何人没有理由去接受它。如果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标准,那么声称这一观点的人也永远无法找出什么标准来证实他的这一观点。

因此,存在着一个客观性的领域,它以共享的观察与逻辑沟通的必需性为基础。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特定的理论,甚至哪一种特定的关于事实的信念是真实的。区分现实与幻象这一问题在社会学中一直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幻象本身就是在日常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的社会世界中产生的。除非我们开始关注并质疑各种现象,否则我们不可能通过事实来检验我们的理论,甚至不

能通过细密的观察来检验我们所假想的事实。关于观念形态和实践问题的争议持续了好几百年,一些人才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日常观念也许并不准确,因此需要经过逻辑整理和经验检验。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由那些有志于此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但即便如此,人类的幻象的很多基本素质仍与社会学知识中的较为坚实的部分混杂在一起。社会学的进步并不是因为社会学家坚信某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而是因为这个学术共同体从其自身的论争和研究努力中打造出了一柄客观性的利刃,是它使社会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个事物除非它有一个名称,否则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在物理世界中是如此——一个植物学家可以注意到几十种植物,而一个外行看到的只是一片田地;对于理解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没有一个人见到过“社会”,虽然我们都见过属于某个社会的人;没有人见到过组织,我们只见过组织中的成员、属于它的建筑物和设备,以及写在各种标牌和纸张上的它的名称和标志。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象征实体,如“财产”——如果没有某种社会惯例的规定,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这种社会惯例是关于人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在谈论它的时候要使用哪些措辞之类的一整套规则;也存在各种象征性行为,如“婚礼”这种登录仪式;它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得以区分出一对男女是“非法地”居住在一起还是生活在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中,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使人作出这种区分。如果人们没有思考过这些象征事物,它们绝不会自然显现。作为与国家分离的社会这一观念是直到18世纪商业和工业变革之后才兴起的,法国大革命唤醒人们认识到存在着两种各行其道的社会机制。100年之后,诸如乔

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这样的思想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象征性质,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概念,使我们能够分析这个世界的运行,而后者在很长时间内被我们视为当然之事。

社会学的多数发展是由于发现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事实,它们之所以不为人知,或者是因为这些事实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或者是因为它们先前被有意识地忽略了。社会学最早的成就是由欧洲人对东方、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探险而激发出来的。在这些被发现存在着极大差异的文化的观照下,欧洲人熟悉的生活方式不再作为神的自然法则被接受。沿着这一方向所作的一些最初的思考是比较天真的,其中主要是进化论的教条,它简单地将欧洲文化视作其他文化的更高发展阶段。不管怎么说,这种理论归纳开创了解释社会的一种思想传统。正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位早期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家首先赋予了这一学科“社会学”这个名称,并因此促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思想家团体”的形成,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些思想家们一直致力于提出各种关于社会的问题。

可以肯定,即使没有库克船长<sup>①</sup>的航海探险,许多事实照样会被发现。但是,穿行到城镇的另一端比一次环绕世界的航行要更困难,而要在自己的家里进行一次发现之旅则是最困难的。各种传统偏见抵制我们去探索和认识那些涉及我们生活的事实,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来说,这些偏见比缺乏事实本身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这些遮蔽社会现实的偏见阻挡了我们认识到它们之为偏见

<sup>①</sup> 库克船长(Captain Cook, 1728—1779年),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主要在南太平洋、南极海洋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边界的海岸地带进行探险活动。——译者

的性质。幻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相信它是事实。那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是他们工作的内在组成部分。他们通过分析各种社会生活条件如何决定了我们意识的内容而打破各种幻象。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我们自身的思想逐步深化的过程,我们不断揭示出先前没有意识到的偏见之根源。

这一揭露的事业是由卡尔·马克思开启的,他是第一个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上来观察生活的伟大思想家。当然,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和社会思想都曾公开地宣称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这也确实是每个人在日常经验中所知道的东西。从意识形态上否定阶层是现代美国的一项发明。马克思所发现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很多我们认为现实的东西只是我们的利益的一种反映,这种利益是社会性地决定了的。马克思也许过于狭窄地把“利益”局限在经济方面,但这一普遍原则无疑是有效的。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以下现象的人:政府会撒谎,报纸、作家以及会谈代表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事实和解释实际上都是根据他们的利益要求被挑选和被歪曲了的。伏尔泰致力于揭露用超自然解释人类事件的荒谬性,这种努力概括了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思想。而马克思则指出,教会所采纳的保守的社会态度正是社会上那些富裕的、有土地阶层的头头脑脑们所期望的态度,这些阶层的上层都是贵族,他们的领袖,如马扎林红衣主教和黎塞留红衣主教,经常在国王的政府中效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越了伏尔泰。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表述本身就存在一个困境:如果观念是物质利益的反映,那么底层阶级是如何接受了并不反映他们利益的观念的呢?这就需要马克思·韦伯和爱弥

尔·涂尔干来提供解决这个困境的钥匙：前者分析了观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认识到了仪式团结的效应。虽然一直存在着我们的观念会被模塑为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统观念保持一致这种威胁，但是由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个初始问题从来就没有退出过。

我们现在知道，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人们是以惯例的形式持有某些观念的，而且群体趋向于采纳能够提高其地位和利益的理念。我们知道，人总是和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人联系密切，而个人则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以使其契合于他所加入的群体的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通过将观念竞争制度化，尤其是在那些其利益是建立在他们在科学和学术的集体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中的人们中进行这种制度化，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

马克思对于社会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并不是一个绝望的告白。这种偏见不会仅因为我们希望它消失就消失，而是需要我们在解释社会的多方面事实中，不懈地努力去充分审查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观念，从而使这种偏见逐步消退。这并不是说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这些偏见。它们是深嵌于其中的，尤其是在政治、偏常（deviance）和分层领域中。但是，我们多少有这个信心，即我们对最有力的解释理论的追寻将引导我们远离意识形态的歪曲，不管其是来自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

马克思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描述社会和评价社会之间、“事实”（这里宽泛地包括经验数据以及总结与解释这些数据的理论）与“价值”之间的区分（马克斯·韦伯首先强调了这一点）。这似乎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发现世界上事物的状态如何是一回事，确定我们认为它是好是坏、是公正还是不



公正、是美还是丑则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大多数思想都是评价性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找出做错了事的人来指责他们，找出英雄来赞美他们，而对于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是确定事实不感兴趣。二战后不久，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即将矛头指向宣传上的“大谎言”(big lie)技术，将其作为极权统治的标志，同时也指向各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歪曲手段，将其作为极端主义政治思想的警示性标志。但如果以严肃的社会学方式进行更细致的辨析，就可以表明，这种区分是幼稚的：所有的政府都在试图操纵其自身的合法性，所有的政治都与口号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而流行的世界观都是由一些刻板印象构成的。如果我们要揭露独裁者或残暴者，观其行要比听其言稳靠得多。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因而具有双重的效用：它提醒我们注意，哪些说法说出了一些现实，而哪些说法只是假设了某些现实，目的是要激起我们对其或善或恶的情感评价；它也将我们引入了对其知识构成不断进行分离和检验的这一艰苦的学科，其有效性并不只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观上。

在社会学史上，与价值偏见的斗争还远没有取得胜利。确实，当前围绕这一问题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在，尤其是在年轻的社会学家(他们个人的同情心强烈地倾向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的受压迫的农民一边)当中有一种强大的趋向，即声称所有的社会学都是有价值偏向的(value-biased)，因而唯一的选择就是道德的选择：你站在哪一边？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指出，那些声称是价值中立的学院派社会科学家们所创立的理论实际上赞美了美国民主的优越，淡化了被压迫群体的困